把孩子日程塞满的是“教育军备竞赛”

□ 曹东勃

针对最近媒体曝光的一些中小学生竞赛组织过程中暴露出的评审不严格、家长代劳等现象，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竞赛主办单位对以往获奖项目的真实性、独创性进行复核，明确提出任何竞赛奖项均不得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加分依据。通知还特别警示：一经发现教师或其他人员存在让他人在未参加研究的成果上署名，代写论文或者代为进行创作、研究，为子女或他人参加评奖提供条件或者支持等违反师德师风或学术不端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几年前，曾有社会学者提出一个深刻的观点，当下教育生态的本质是“军备竞赛”。应试只是病象与症状，“军备竞赛”才是病灶与病原。最近的一系列事态，正是沉疴多年、痼疾难去的“教育军备竞赛”的升级。中国社会对通过教育公平促进社会流动有着高度信赖，考试（本质上也是一种选拔或竞赛）作为拣选人才的重要机制，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问题在于，当这个机制本身遭遇到异化，无论以何种“素质教育”的名义来“转制”，都会留下漏洞和机会。

中小学教育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主要导向是注重教育公平和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就此意义上看，这些年来，教育部门推动的为中小学生减负、为大学生加压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一部分家长对此并不理解，“只缘身在此山中”。倘若跳出来看看子女在培训班上所学的内容，对比我们自身在相同年龄阶段所认识和理解的世界、习得和掌握的知识，恐怕要大跌眼镜。这种“过度教育”和超前教育究竟带来了什么？这种影响全社会的大型“军备竞赛”现场，意味着什么？

上世纪80年代，国内教育界曾掀起一股研究皮亚杰的热潮。尽管对于这位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的一些观点，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关于儿童发展、成长与学习的很多见解，今天看来仍大有启发。

皮亚杰认为，儿童并不只是受教于成人的灌输。真正的学习，是儿童自己找到和发现自己的答案。家长、教师的教育和引导，必须遵循渐进的、适度新颖的原则，既要跟儿童既有的认知结构和生活经验建立一定联系，同时也要足够新颖，带有一定的挑战性，这才能产生认知上的“有益”冲突，进而诱发儿童的兴趣。因此，那种超越儿童认知水平的揠苗助长，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满足了家长的虚荣心，至于是否入脑、入心，那完全是不以家长意志为转移的。

最近，一向反对超前教育但对妻子无可奈何的我，也“勉为其难”地接手了对孩子一部分作业的辅导。一个5岁的孩子，在没有形成符号观念和数的概念的情况下，非要去让他理解某些数学逻辑；在还处于皮亚杰所说“前运算思维”或“自我中心”的状态中，非要让他做到跳出“第一视角”、开启上帝视角，通过脑补来洞悉几何图形的变幻转型。这是何等艰深的任务！

由此联想开去，让一个小学生跑到实验室“研究抗癌”，其真实情况也正如调查结果所显示的那样：“项目研究报告的专业程度超出了作者认知水平和写作能力，项目研究报告不可能由作者本人独立撰写。”

皮亚杰还提醒我们，思维开端于动作，但是思维结构的精细化和高级的运算结构得益于语言，而语言能力的丰富和发展不是刻板课堂教出来的，必然是儿童在充分扩大其社会交往特别是与同伴的交谈和讨论中熏陶而成的。很多家长把孩子的日程塞得满满当当，自以为是在加速其智力开发，其实恰恰可能丢失了更为宝贵的一个方面。古人有“为学日增，为道日损”的告诫，我们固然不必将其极端化解读，但一味注重智育而忽视德、体、美、劳的教训，不是比比皆是吗？

当严酷的“教育军备竞赛”封闭了少年感知社会与科学的触角，吞噬了他们的全部精力，除了批量制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呢？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影院重启：人们为何钟情老电影

□ 何小凡

电影院停业近半年之后，终于在7月20日迎来重启。保证陌生观众间距1米以上、上座率不得超过30%、必须全程佩戴口罩……一系列限制措施并没有影响人们的观影热情，据猫眼数据显示，在各地影院还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复工当日全国院线就出票15万余张，票房突破350万元，而这其中有将近六成来自复映影片。

受疫情影响，影视行业还有一段较长时间的恢复期，诸如《当幸福来敲门》《中国合伙人》《风声》等十几部经典影片扛起了复工的大旗，为重启影视产业燃起了火种。

老电影重映并非新鲜事，大家熟知的《泰坦尼克号》《海上钢琴师》《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等都曾重新走入电影院，并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与其说人们偏爱老电影，不如说人们钟爱好电影，电影并非是时间可以赋予其价值的古董，反而是本雅明所说的一种“机械复制的艺术”，老电影的生命力不在于“老”，而在于电影本身的品质和它们所承载的记忆与感动。

今年3月，华纳兄弟电影宣布《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将在中国内地大规模重映，消息一出，就令众多影迷期待不已。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几乎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时光，费尽心思借来DVD、偷偷钻进电影院、课间讨论人物剧情、捻起铅笔假装念咒语……这部电影的重映，就好像重新给了我们一张通向霍格沃茨的车票。

有人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影院是不可取代的梦境。一张周末的电影票，代表着日常生活的一种“中断”。步入影院，借由幽暗的环境和大荧幕中的光影流动，人们得以从工作学习的压力中暂时解脱，开启一段全新的历程。而那些经典老电影，就好像一个个秉承过往的梦境，不断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

以后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过去观众接触电影最普遍的方式不是触手可及的电子设备，也不是各种配备“高精尖”的电影院，而是一台胶片放映机、一块大白幕布，仅此而已。设备虽然简陋，“上座率”却居高不下。那些在今天看来有些乏味甚至略显浮夸的老电影是那个年代的“豆瓣高分”，虽然对画面和情节的印象已经逐渐模糊，但夜空下人们的那份专注和夏日里闷热的空气却永远停留在了记忆中。

互联网飞速发展，普通人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资源，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观看世界各地的影片，一大批经典电影也开始奠定它们在影迷心中的地位。《肖申克的救赎》中身处绝境仍怀抱希望的安迪，《霸王别姬》中不疯魔不成活的程蝶衣，《海上钢琴师》中终其一生在海上度过的1900……这些老电影不仅让我们体会到了别样人生，更让我们在光影中窥见生活，在人物中感受到自我。

近年来，3D、IMAX、杜比音效等一系列视听技术更是不断革新着人们的观影体验，但对于影迷来说，更为真切的感受却可能是烂片横行，处处踩雷。资本裹挟之下，很多时候电影不再是一门艺术，而是机械化的流水线工程。

幸运的是，还有无数电影人秉承初心，在市场化的背景下静心打磨作品，更多好电影开始涌现出来，迈入了经典的行列。此次重映的《寻梦环游记》《夏洛特烦恼》《哪吒之魔童降世》都曾人气口碑双丰收。它们虽然还不够“老”，但仍然可以在时间的重力下沉淀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这个特殊的时节，经典电影的重映不止于挽救受到重创的影视行业，更是在点亮人们的生活。造梦工厂姗姗来迟，生活也终将迎接它应有的色彩和阳光。

清理违规兼职 重塑律师形象

□ 欧阳晨雨

今年4月，一则“高管性侵养女”新闻的曝光，让原本不为人所知的鲍毓明，成为千夫所指。在舆论的持续关注下，4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宣布，已派联合督导组赴山东，对鲍毓明性侵案的办理调查进行督导。

不仅如此，这位拥有美国国籍的中国律师，逐步与多头兼职开始剥离。4月9日下午，杰瑞集团发布声明已与鲍毓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4月10日，中兴通讯官方微博也发布声明称，鲍毓明辞去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根据近日一份《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在律师队伍中开展违规兼职等行为专项清理活动的通知》，司法部决定自2020年6月25日至9月25日，在律师队伍中开展违规兼职等行为专项清理活动。该通知发出之后，多地司法厅（局）已部署本地开展专项清理活动。

翻开鲍毓明的履历，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人生赢家”的观感。1972年出生的他毕业于“985”院校，拿到中美两国名校硕士学历，拥有教育部认证高层次海外留学人才，全国十佳总法律顾问等身份。自1996年起，他先后在京津地区律师事务所任合伙人，曾任美国思科、美国新闻集团、中国香港南华集团等跨国企业资深法律顾问，还曾任中兴通讯独立非执行董事、杰瑞股份及其附属公司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

问题是，这些原本熠熠生辉的履历，此时已经变得“千疮百孔”。比如，鲍毓明的违规兼职问题。根据律师法，“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一般情况不允许律师兼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人员，虽然可以申请兼职律师执业，但必须符合律师执业法定条件，并经所在单位同意，通过司法行政部门的审核。在司法部出台的《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兼职从事律师职业人员管理办法》中，也有“律师在从业期间应当专职执业”等规定。对于鲍毓明来说，原本身份是北京市泰德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却担任企业管理人员，未将主要精力用于律师服务业务，显然违反了律师法规中关于律师兼职的规定。

不仅如此，鲍毓明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外国人。根据国籍法规定，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定居海外并取得外国国籍的人，将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也就是说，鲍毓明从取得美国国籍之日起，就不再具有中国国籍。之前，国家外国专家局认证外国专家，也确认了鲍毓明的外籍身份。司法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将具有中国国籍作为报名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前提条件。这就意味着，一个外国人是不能取得中国法律职业资格。当鲍毓明取得美国国籍后，之前的中国法律职业资格成为“无本之木”，遑论律师执业。

从司法部部署清理工作看，类似鲍毓明的情况恐怕不是个案。法律之所以禁止律师违规兼职，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律师队伍的相对稳定，持续向社会输出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执业律师如果能随心所欲兼职，既有律师事务所的身份，又有多个企业高管的任职，很难想象，这样的多重身份下，能拿出多少精力投入法律服务。法庭上的他们，又能如何让被代理人相信，违规兼职不会干扰法律服务。

通过这样一次上下联动的专项清理活动，有利于为律师队伍剔除不纯“杂质”，遏制违规兼职之风。“能够在限期内主动辞去其他工作、能够符合律师执业条件或者恢复中国国籍的，经批评教育，可以不予注销其律师执业证书”，留出了一定的宽容期限，也为清理注入更多情理性。全力锻造一支更规范的律师队伍，最终将让公众收获更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开机广告关不了？消费者有权“一键关闭”

□ 熊 志

近日，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关于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整改情况的最新通报。经过4轮整改，除乐视外6家企业整改均取得显著成效。6家企业履行售前告知义务落地情况良好，且提示页面不存在“开机广告不可更改、删除、关闭”等明显剥夺消费者选择权字样。此外，“一键关闭”取得重大进展。（《工人日报》7月20日）

智能电视逐渐普及之后，开机广告已经成了被吐槽千百遍的问题。对消费者来说，看电视之前，必须得看一段长达15秒或者30秒的广告，无法跳过，更无法一键关闭、永久去广告，甚至广告音量大小都无法调整，用户体验相当糟糕。然而即便用户接纳程度极低，开机广告依旧成为行业惯例。因此，江苏消保委去年约谈相关品牌，敦促其限时整改，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舆论支持。

就整改成效而言，尽管长达4轮的整改过程有些曲折，但6家企业删除了“开机广告不可更改、删除、关闭”等字样，且提供了一键关闭选择，让消费者有更多自主权，这无疑是好的结局。这次整改相当于重新树立了行业规则，有利于规范开机广告，提升智能电视的用户体验。

从市场公平的角度看，消费者本就有对强制性开机广告说不的权利。一些品牌企业以行业惯例为挡箭牌，或者认为智能电视不涉及垄断强制销售，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品牌，捆绑开机广告就理所应当，殊不知这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正当权利。

以知情权为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这里所指的真实情况，包括价格、产地，同样包括服务的内容、规格等等。

然而在现实中，厂商在线上或者线下销售时，往往会回避该问题，而不会告知开机广告的相关事项和广告内容，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另外，开机广告无法跳过、一键关闭，同样损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如此明显的侵权行为，之所以发展成了行业潜规则，店大欺客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强制开机广告对企业来说，是一块相当大的“肥肉”。比如此前有报道显示，某电视品牌的开机广告，报价达到180万元一天。在价格战如火如荼的市场竞争下，一些品牌也转变了思路：通过压低硬件销售价格吸引消费者，同时从开机广告中寻找利润来源。

经过江苏消保委对几大品牌的整改，广受吐槽的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乱象，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清理。不过也要看到，相关乱象并非完全清零了。一方面，江苏消保委7月的调查显示，6家电视品牌对“一键关闭”的总体落实情况为71.43%，也就是说还有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另一方面，尽管消保委提请了公益诉讼，还是有品牌电视对整改无动于衷。在此前提下，治理开机广告乱象，显然需要进一步发力，为行业立规。

就在前不久，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发布了《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服务规范》，将于9月正式实施。首部正式的行业规范要求，厂商在销售时，必须告知消费者开机广告的服务内容，不得隐瞒；同时，开机广告不能超过30秒，且要有明确的关闭提示信息。

相信通过地方消保委的整改，对拒不整改的公司的法律诉讼，再加上行业协会的自我约束，可以为开机广告问题提供更为明确的行业规范。在这里，也得提醒那些电视品牌，贪恋开机广告的利益，牺牲用户体验，只会造成口碑的持续损伤。

这届年轻人“报复性存钱”没什么可奇怪的

□ 默 城

近日，一份“90后攒钱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90后更爱攒钱了，2020年上半年90后人均攒钱金额比2019年增长近四成。

看到年轻人“报复性存钱”的新闻，我并不感觉到新奇，因为自己和身边的很多小伙伴，都是存钱大军中的一员。我们的普遍感觉是，90后与80后相比，更会存钱，更能存钱。至于消费，也没想象中那么铺张浪费，更多的还是精准消费、刚性消费。

疫情发生以来，年轻人这种“报复性存钱”愈演愈烈，其实很容易理解。很多年轻人明白，只有增加现金储蓄，才能提高自己面对风险的安全指数，做到游刃有余。在能赚钱存钱的时候，少花点多存点，成为无数年轻人的共识。

90后尤其是95后工作年限不长，他们的工资并不高，除去房租和日常生活消费，基本就是“月光”了。如此一来，又靠什么存钱呢？对此，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的答案是，存钱自然也不能只靠一份工作。眼界更高，选择才能更多。

我身边的年轻人，存钱且存得多的，除了有一份稳定工作外，基本都有额外的副业或者兼职，他们也被称为斜杠青年。他们信奉的理念是：要极力开发自己的潜能，开发空闲时间，让这些来变现，而不是月月等着一份死工资开支。当然，他们也不是纯粹为金钱折腰，逼自己去干不喜欢的事情，而是让兼职成为丰富生活体验的方式。

我自己也称得上是一名“存钱小达人”。我的存钱之路要追溯到大学时代，由于专业的缘故，从大二开始，我就获得了很多赚外快的机会。到了大三、大四，在实现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还能有一点存款。当时我的原则就是，只要机会来了，而且有能力去做，且不违法、不违背良心，那就“来者不拒”。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现在，有正常的工作，也有很多的兼职，结果就是机会越来越多，存钱也越来越多。

我的存钱技巧就是拼命赚钱，正常花销，花剩下的就是存的钱。毕业以后，存钱也有了具体的目标，那就是买房，这不仅是父母的要求，也是我自己的希望。存钱的方法和套路也很简单，就是定时打给父母，让他们帮忙存着。一个是这样更有奔头，另一个是能控制自己乱花，一般每隔一两个月打一次。

几年过去，存款已经相对可观，而这笔钱，随后就被我扔到了房子的首付里。一打听才知道，身边存钱的小伙伴，基本都是奔着房子去的。最近，好多朋友都用自己存的钱，再加上父母的补贴帮助，买了房子。今年年初发布的《2020中国青年居住消费趋势报告》显示，95后购房占比大幅提升，购房群体年轻化趋势明显。

其实，年轻人存钱买房子，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提高抗风险能力。这和疫情后年轻人“报复性存钱”的现象，所指向的本质是一致的。这些现象所折射出来的年轻人追求安全感的社会倾向，值得舆论聚焦和关注。

八百里洞庭筑起“青春堤坝”

（上接1版）

7月11日13时30分，吴永锋接到指挥部命令：洞庭湖大堤粮仓湖段桩号1+450至1+550段发生内滑坡险情，抢险队立即出发，15分钟即赶到距离抢险队宿舍6公里以外的处险点。处理完险情已是12日凌晨3时55分。

突击队一组组长严家治2019年年底成为监狱人民警察，军旅锤炼8年的他体能好，抢运砂石袋，别人扛一袋，他扛双份。

7月15日，严家治带领组员在水下用沙袋填补被浪打坏的外坡缺口时，不小心伤到手，右手虎口鲜血直流，组员纷纷劝他就地休息，站在旁边当“指导员”。医护人员对他的伤口进行简单消毒包扎处理后，他又站在水里，搬石头、沙袋堵缺口，和其他组员一起干得热火朝天。

吴永锋说，突击队员中像严家治这样的人和事不胜枚举。41名青年突击队员绝大部分是90后，在滔天洪水中，他们用行动证明：自己是新一代铁骨铮铮的湖湘好儿郎。

位于常德的津市监狱地处涔水、澧水交汇处，东南北三面环水，西靠北民湖，辖区堤防28.2公里。7月6日，根据常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通知，监狱启动防汛II级响应，按照I级响应采取应对措施。

津市监狱团委在监狱党委的统一部署下，第一时间组建青年突击队100余人，承担防汛急难险重任务，在防汛一线构筑起“青春堤坝”。

洪水来势凶猛，水位从警戒水位一直上涨，直到距保证水位仅0.15米。面对不断上涨的洪水，青年突击队员长时间不间断巡堤，雨水混合汗水，警服上“绽放”出一圈圈盐花；来回在灌木丛排查隐患，蚊叮虫咬满身是包，蛇与蜈蚣常傍左右，蜘蛛网成为脸上头上的“时尚装扮”。无论白天黑夜，队员们一有险情就拿起工具奔赴现场。

津市监狱团委书记邓超维说，截至7月13日，该狱青年突击队参与大堤巡逻查险任务达400余人次，处置险情达150多处。

相隔不远的赤山监狱位于益阳市沅江境内。北临西洞庭湖，沅水、澧水交汇于此，洪道窄，水流大，涨水快。7月9日，监狱外河水位涨至36米，突破保证水位，监狱启动II级应急响应。10日中午，外河水漫进大堤西段路面，侵蚀外围墙基础。一旦围墙垮塌，洪水危及内堤，后果十分严重。

赤山监狱决定立即集结青年突击队抢筑子堤。一声令下，100余名突击队员迅速到位。

22岁的女警余艳环送物资到防汛指挥部，看到汛情严峻，她义无反顾加入抢险队伍。她和男队员提着同样重的砂石袋，依然咬牙坚持。

突击队员里还有10多名湖南司法警官学院实习生“加盟”，这群时常被贴上“自我”“稚嫩”标签的00后，关键时刻没有一个叫苦喊累。队员们汗如雨下，浑身湿透，手掌起泡，肩膀红肿，依然斗志昂扬，比原计划提前3个小时筑成子堤。

面对多轮强降雨，眼见基层警力已十分紧张，湖南省监狱管理局青年警察纷纷请战支援一线。7月12日清晨，15名主动请缨的机关青年警察迅速集结，冒着大雨赶赴津市监狱，投入到防汛战斗中。

（上接1版）

适龄儿童要经历规范的入队程序，完成规定时间和内容的组织教育，通过自评、互评、他评进行量化评价……这样的入队过程，将成为铭刻在孩子内心的记忆。

为引领队员天天有目标、时时有进步，“红领巾奖章”成为少先队组织日常开展教育活动和评价激励的重要载体。奖章获得情况也作为各级“优秀少先队员”“优秀少先队集体”评选的重要依据。根据不同年龄段特点增设的少先队服务岗位，更为“人人能服务，个个都成长”创造出更多机会。

疫情防控期间，浙江杭州市下城区各个学校开展富有特色的“红领巾奖章”活动，将争章活动融入队员们居家防疫期间的成长激励中，提升队员的防疫自护能力，增加队员的社会责任感，提高队员的使命感，促进队员全面发展。参与防疫宣传、居家巧锻炼、积极劳动……该区天水小学的少先队员们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争章实践活动。

队前预备、队中教育、离队输送，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面向6周岁至14周岁的全体少年儿童，涵盖少先队员成长全过程。站在党团队一体化建设的高度，着力强化团队衔接，团中央、全国少工委明确年满14周岁、未满15周岁的少先队员作为团的发展对象，原则上必须经过少先队组织推荐。

第八次全国少代会即将召开，此次代表推选过程中，突出体现阶梯式成长理念，将当选过地市级及以上少代会代表或获得过地市级及以上荣誉作为重要参考条件，努力将认可度高、示范性强的优秀少先队员推选出来，有效激发少先队员的内生动力。

有组织的实践体验，让光荣感培育更加“走心”

少先队是党创立并领导的少年儿童群团组织，必须发挥实践育人独特优势，用红色基因塑造少年儿童，用共产主义道德感召少年儿童，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路径增强光荣感，为党培育更多的“红孩子”。

在通过实践体验培育少先队员光荣感的过程中，实践教育体系、实践活动品牌以及劳动教育，成为重点关注的方面和主要工作抓手。

全国少工委积极发动基层少先队组织在开展校内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少先队员走进各级党政机关、生产一线等开展有组织的实践体验活动，构建校内外互为补充、有机衔接的少先队实践教育体系。

在贵州，少先队组织在“建起来”的基础上正不断向“强起来”“活起来”发展，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不断增强。浙江、江苏等地探索建立红领巾实践教育基地、绘制红领巾实践地图，为少先队员走出校外、走向社会提供指引。

“红领巾小小讲解员”“红领巾护界碑小队”“红领巾小河长”……各地结合地缘特点和资源优势，创新开展各种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各级共青团、少先队组织还开展丰富多彩的红色教育、志愿服务、科技创新、素质拓展等夏冬令营、研学活动，打造以“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为统领的少先队实践活动品牌，让少先队员们在丰富的实践体验中开拓视野、文明精神、野蛮体魄。

着力强化劳动教育开展以来，一大批“红领巾小农场”“红领巾小菜园”等劳动基地在各地涌现，少先队员们在田间地头辛勤劳动、挥洒汗水，在火热的实践中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增进对普通劳动者的感情。

融入学校、家庭、社会教育格局，让光荣感培育得到全方位保障支撑

少先队是党在少年儿童工作领域的重要力量，是联结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重要桥梁纽带，必须坚持组织化和社会化并进，推动少先队工作机制和工作方式的深彻变革，为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提供有力保障。

为此，各级共青团、少先队组织都在用心用力。抓住关于义务教育、教育督导等多个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党建带团建、队建”的重大契机，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制定《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党建带团建、队建 加强少先队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的意见》，推动将少先队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教育工作规划、纳入中小学党建工作规划，强化学校党组织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持续推动建立学校少工委，明确由学校党组织书记或党员校长担任少工委主任。

过去主要在校园里举行入队仪式，两年前，上海鼓励走出课堂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场馆等举行。新队员在入队仪式后还可以通过游园的方式，检验队前教育的效果；亲子对话被引入到入队仪式中，新队员戴上红领巾，父母则回忆起自己在少先队生活中的难忘故事……新的入队仪式实实在在提升了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

近些年，黑龙江、吉林、山东等省份出台加强少先队工作的具体实施意见，各级少先队工作环境普遍得到优化。

为规范大、中、小队建设，少先队组织工作条例推出并试行，校内少先队组织基础得到夯实。

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逐渐构建。各级团组织、少工委探索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有效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基层党群活动场所等各类阵地，动员“五老”等各界力量，不断提高少先队社会化工作水平。

近些年，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要求各级少工委注重从优秀校外思政课教师、团干部、青联委员、各行业先进人物以及拥护党、高素质的家长中选聘校外辅导员，整合社会力量，为校内外开展少先队活动创造条件。除此之外，还坚持每年在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北戴河活动营地等开展培训和实践活动，擦亮共青团、少先队实践品牌。

上海、浙江、贵州等省（市）探索建设社区少工委，发动周边学校教师、志愿者、党员干部等组成校外辅导员队伍，组织开展红领巾小社团、红领巾广播站、研学等活动，服务少先队员健康成长。